

曹操与道教及其他仙游诗研究

IQI XIANYOUSHI YANJIU

陈 华 昌 著

AANXIRENMINCHUBANSHE

序

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是文學研究者一直鑽研的課題，其中很多有關曹操的片斷，如其政治上之操守、文學上的造詣，自陳壽《三國志》面世後，研究者都有不同的見解。司馬遷列項羽入〈本紀〉，有人認為此乃史遷立例破例最好的證明。陳壽之《三國志》，一直以曹魏為正統，這當然也為其先驅者司馬遷之筆法，互相呼應。

曹操與太平道、五斗米道及游僊詩，無論從宗教史、科學史、文學史及政治史，古今學人，都有不同的觀點，然不同時代，對這些問題都有不同的解釋。陳壽之正曹魏，北宋司馬光也大力支持，這當然是時代在政治上要求。但朱熹之視曹魏為不正，羅貫中隨之，當然也是政治的產物。“正”與“不正”，事實上都是一個名詞而已，但在論及正與不正之時，中國史家往往不肯放棄個人的立場，堅持己見，這當也是個人政治立場的表現。

在中國戲劇上，無論京劇、粵劇或其他地方戲劇，扮演曹操的演員一直是以花臉出現。但文革期間，曹操的扮相，棄花臉以老生代之，加上在歷史研究上言，曹操也被列為法家與諸葛亮同級。陳壽在《三國志》中，對諸葛亮評價并非正面，但文革期間，曹操和諸葛亮，變成同舟共濟，當然也是政治運作的必然性。

南宋朱熹之《通鑒綱目》一出，桃園三結義的問題、曹操的問題、諸葛亮的問題，有了肯定性的處理。無論在戲曲上、文學上，都受到朱熹定論的影響，這的確是難以理解的事。

陳華昌博士花了多年的時間，撰寫《曹操與道教及其游仙詩研究》一書，使讀者對曹操在歷史上的地位、文學上的成就和宗教上的影響有更進一步的瞭解，也補充了有關魏晉研究這一段的不足。

古代人物的家世，一直是研究者感到最棘手的課題，因經過歲月的變遷，戰火的蹂躪，北方人民流徙他鄉，使許多材料難以搜集，只能憑有關人物的詩文、師友的文章來進行重建（Re-construction），在這方面，陳華昌博士替研究魏晉的學者，解決一個重要的問題。

西方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比較重要的學者有高羅佩（R. Van Gulik）、侯思孟（D. Holzman）和張磊夫（Rafe de Crespigny），對方術、方士等問題，他們有專書談及，同時亦提到這期間煉丹的問題。陳華昌博士此書，對這問題也有深入的研究。煉丹本來是科學發展的一環，希臘人早已有不同文獻詳加見載。魏晉期間，中國社會在道家倡導下，可說大行其道，李約瑟之《中國科技史》也有深入的介紹。陳華昌博士從中國文學中道出當時之修煉，與李約瑟等人從科學史眼中所推敲的結果，可謂異曲同工。

這是一本值得介紹的好書，它除了道出曹操及其家世外，也涉及當時的政治、科學和宗教的活動，也道出政治角力除了鬥力外，最重要的是靠個人的智慧和集體的心思，陳華昌博士就是本著這個理念，寫出了這本任何方面人士都值得閱讀的好書。

趙 令 揚

二〇〇二年七月七日

目 錄

序	1
第一章 緒論	1
一、研究之動機與目的	1
二、曹操研究之歷史與現狀	6
三、研究之範圍與方法	33
第二章 曹操家世與黃老道	39
一、曹操為曹參之後辨析	43
〈一〉從姓氏源流看曹氏三祖說之根據	45
〈二〉曹參與曹操不同始祖	49
〈三〉關於曹參家譜的考察	51
〈四〉曹操家譜的探索	57
二、曹騰信仰黃老道辨析	69
三、曹操自稱曹叔振鐸之後動機辨析	80
〈一〉曹操自作《家傳》之背景試探	81
〈二〉曹操關於周人的論述	83
〈三〉曹操回避黃帝之原因	87
四、結論	96
第三章 曹操與太平道	103
一、《太平經》和太平道	104

RBA65/06

二、曹操對太平道的政策及其出發點	153
三、重新評價曹操鎮壓黃巾的歷史公案	168
四、結論	201
第四章 曹操與方術	214
一、漢代的方術	214
二、曹操招聚方士之目的與政策	218
三、曹操招致方士之情況	222
四、曹操習練方術之情況	227
五、結論	237
第五章 曹操和五斗米道	242
一、占據漢中之前的五斗米道	244
二、張魯政權之性質	261
三、征張魯中的兩次思想動搖	281
四、張魯降曹原因辨析	289
五、曹操優待張魯之原因	295
六、結論	298
第六章 曹操之游僊詩	305
一、淵源	308
二、主旨	323
三、結論	343
第七章 結論	348
附錄 徵引及參考書目	359
後記	391

第一章

緒 論

一、研究之動機與目的

二十世紀之中國學術史，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前五十年為第一階段，即中國現代學術之初步建立階段。在此階段，由於外來學術思想的引進，傳統的、古典的學術思想被批判、改造，現代學術觀念得以初步確立。西方的各種學術思想、觀念，各種研究方法，都在中國找到了市場，互相競爭、沖撞，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

從五十年代到 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第二階段。馬列主義被確定為指導思想，在各個領域出現了一批研究成果。同時，簡單化、片面化、絕對化的



形而上學思想和風氣開始生長，成為學術進步的桎梏。“十年浩劫”時期，極“左”思潮更是甚囂塵上，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整個社會生活都被徹底地政治化了。學術成為政治的奴婢，喪失了自我，也喪失了科學的品格。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一股思想解放的浪潮在神州興起，傳統的、僵化的理論受到懷疑，一些長期形成的理論“禁區”被打破，學術界開始對長期干擾學術研究的“左”傾思潮進行反思和批判，“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被重新確立。與此同時，各種門類的學科開始從政治奴婢的地位下解放出來，探尋本學科的特殊本質和發展規律，建設本學科的理論體系和方法論體系，向一度失落的自我回歸。各學科都出現了一種各派理論相互沖撞、互相促進的生動活潑的新氣象、新局面，學科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學術水平達到了新的高度，學術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但是，思想解放是長期的任務，清除“左”的思潮的影響也是長期的任務。“左”的思潮由來已久，根深柢固，其發生、發展雖然開始於五十年代，泛濫於六七十年代，但從深層次方面探尋，可以發現其與中國幾千年傳統思想的血緣關係，真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泛政治化”的思想和理論，乃是極“左”思潮的核心，在一切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觀念下，學術的價值取決於“服務”作用的大小和質



量，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依據，因而一些學科被斥為“無用”，而一些“有用”的學科則喪失了科學性和嚴肅性，成為政治的工具。例如歷史學，一直被作為“有用”的學科而加以提倡和鼓勵，但在“服務”觀念的誤導下，歷史考據學被視為資產階級的治學方法而受到歧視，“以論帶史”、“厚今薄古”、“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受到大力提倡，而“論從史出”、“厚古薄今”、“歷史主義”受到批判，歷史的真實性受到蔑視。發展到“文化大革命”中，歷史學完全墮落為“影射史學”，演出了諸如“批宋江”、“評法批儒”等一幕幕歷史鬧劇。這種號稱“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極端思想和做法，在骨子里恰恰是“傳統的觀念”在新時代和新形勢下的翻版。

秦王朝將法家思想定為國家統治的指導思想。法家思想的核心是“尊尊”，將君權推崇到極端的地步，在思想上實行專制主義，不容許異端思想的存在，以適應建立大一統封建王國的政治需要，因而“焚書坑儒”。這種極端的野蠻行為卻受到頌揚，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採取了這種粗暴破壞文化的方式，並且掀起一場“評法批儒”運動，暴露了“左”傾思潮和法家文化專制主義的聯係。

“左”傾思潮以最徹底的反儒家思想的面目出現，是否其真正實現了和儒家傳統觀念的“最徹底的決裂”呢？儒家思想的本質特徵是將整個社會生活政治化。



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謂“三綱五常”，其實質是將屬於政治範疇的君臣關係的思想原則作為社會生活範疇的父子關係、夫妻關係等人際關係的思想原則。將社會生活政治化的同時，意識形態也自然政治化，違反孔孟之道就不是思想問題、學術問題而成為政治問題，自然就受到政治迫害。“左”傾思潮的“泛政治化”特徵和儒家思想在深層次上是一致的。

法家思想、儒家思想都是適應當時社會需要而產生的思想，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起過重要作用。尤其是儒家，自漢武帝（劉徹，前 156—前 87，前 141—前 87 在位）“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之後，一直被歷代統治者奉為政治的指導思想，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至今仍然有其積極的意義。但是，極“左”思潮汲取的恰恰是其封建專制主義的糟粕，而不是民主性的精華。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封建思想滲透于社會生活的各種層面，積澱為整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成為極“左”思潮賴以滋生的深厚土壤，再加上極“左”思潮以最革命、最超前的外衣加以包裝，便頗能迷惑人。這就是為什麼“文化大革命”偏偏發生在中國而不是其它國家的主要原因。因此，清除極“左”思潮的餘毒仍是長期而艱巨的任務。現在，歷史學界還在討論歷史學的社會功能問題，有人發出歷史學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究竟有沒有用的問題，其實質還是用“實



用”、“服務”的標準來衡量學術存在的價值，和“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是同一種思惟方式。這說明歷史學尋求自我的道路還很漫長。

之所以選擇“曹操（155—220）與道教及其游仙詩研究”作爲研究課題，從史學史的宏觀角度看，這是一個歷史跨度長，從一個視點上能反映各個歷史時期學術研究水平和特徵的課題。曹操是一個在中國歷史上起過重大作用的歷史人物，也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由于《三國演義》和三國戲的廣泛傳播，其在中國民間的知名度，更非一般封建帝王可比。對於曹操的評價、往往隨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變化。政治對於學術的影響，在曹操研究問題上反映得比較突出和充分。古人對曹操評價產生的分歧，根源于“正統”的政治觀念。二十世紀初，錢玄同（1887—1939）和胡適（1891—1962）在《新青年》上討論過曹操和《三國演義》的問題。事隔十年，魯迅（1881—1936）也在一篇文章中說了曹操不少好話。1959年，中國大陸掀起了一場爲曹操“翻案”的運動。“文化大革命”中，曹操又被推崇爲法家人物的代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關於曹操評價的爭論又起。可以看出，曹操是各個歷史時期學術視野聚焦的人物。

從橫向方面看，“曹操與道教及其游仙詩研究”是個超學科的課題，橫跨歷史學、宗教學和文學三個領域，學術涵蓋面較廣，涉及到的學術問題很多，如關



于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問題，農民起義和宗教問題，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發展動力問題，太平道黃巾和五斗米道張魯漢中政權的性質問題，《太平經》的階級屬性問題，游仙詩的評價問題，等等。其中，有些問題屬於學術理論的帶有根本性的重大問題。

“曹操與道教及其游仙詩研究”既是一個歷史跨度長、涵蓋面廣的多學科綜合研究的課題，且涉及到許多學術理論的重大問題，自然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深入這個課題的研究，從史學史的角度總結各個歷史階段關於此問題研究的得失，特別是近五十年學術發展的曲折道路，有助於總結經驗教訓，有助於清除極“左”思潮的影響。並且，由於該課題涉及到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深入研究該課題，雖然不能最終解決這些問題，但至少可以為探討這些理論問題提供一個例證，有助於問題的深入研究。如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動力問題，農民戰爭的歷史作用問題，農民起義和宗教問題，深入研究曹操和太平道黃巾、和五斗米道張魯的關係，無疑對解決以上問題有較大幫助。這就是本文寫作的動機與目的。

二、曹操研究之历史与现状

在中國歷史上，祇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像曹操那



樣引起長期而廣泛的爭議。自魏晉始，對曹操評價的分歧便開始出現，爭論一直繼續到現在，似乎永無一致的可能。回顧前人關於曹操之討論，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從魏晉至清末為第一階段，本世紀前五十年為第二階段，本世紀後五十年之前三十年為第三階段，本世紀最後二十年為第四階段。現將這四個階段的情況作一概述。

1. 古人对曹操之评价

曹操之主要事迹記載於陳壽（233—297）之《三國志》及裴松之（372—451）所作注解。

陳壽撰書之時，魏、吳已先有史，王沈（？—266）《魏書》、韋昭（204—273）《吳書》屬官修，魚豢《魏略》屬私撰，惟蜀國無史。壽乃在三書基礎之上，廣採博搜，終成巨著。陳壽之後百三十餘年，裴松之為之作注，至宋文帝（劉義隆，407—453，424—453在位）元嘉六年（429）始成。裴注宗旨在於補闕、備異、懲妄、論辨，而重點在補闕。故裴注徵引魏晉人著作達百五十餘種，字數達五十四萬餘字，近《三國志》之二十萬字三倍。

作史者既多，立場各異，記事之詳略取捨、議論之是非曲直，自然不一。趙師令揚曾指出：

正統在修史而引起爭論，則應以陳壽修三國志時主魏所引起。陳壽編三國志時，漢早已為晉所取代。陳壽以三國時蜀人入仕晉



室，不得不因晉而推魏。從理論上言：先主自言以漢裔繼漢，自合繼統之道，則正宜蜀。以政治形勢而言，曹魏據有中原之地，上承漢代之局，下開晉室之基，則正統在魏。從實際上言，陳壽已盡持平之法，三國鼎足，各紀其年，重要之關連，則互記之，亦無強調正統所在，然因為魏立本紀，蜀則無之，但稱先主，後主。吳國方面，自孫權以下，直呼其名。三國正統之所在，因陳壽此舉明矣。其重蜀輕吳之處，也因其為蜀人之故。然陳壽不以其書名曰魏書，不與前漢、後漢、晉書同例而名三國，則可見在他的史觀中，三國是并列的，也可見陳壽用心之良苦。①

正因為在陳壽之史觀中，三國并列，所以他對人物之史實記載基本真實可信，當然亦有回護問題。其對曹操之評價甚高，《武帝紀》卷末云：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并起，而袁紹虎眈四州，彊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擘中、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②

陳壽本蜀人，蜀亡後入仕於晉。晉乃由魏“禪讓”而立，故奉魏為正統。陳壽之史觀雖以三國并列，但

修史不得不站在晉之立場。且所依據之材料，多出於魏官修之王沈《魏書》及魏人魚豢之《魏略》，故對曹操稱頌有加。

吳人所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孫盛(302—373)《異同雜語》、《雜記》、《魏氏春秋》即對曹操多有不利記載。如“殺呂伯奢家人”一事，《三國志》不載，而裴注引《魏書》云由其子與賓客共劫曹操而引起，郭頒《世語》謂由於曹操多疑而起，孫盛《雜記》謂“夜聞食器聲”而誤會。^③立場不同，記載各異，特別是孫盛記曹操殺人後，發現誤殺，卻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將一次過失上升到極端利己主義人生哲學高度，對曹操形象之醜化，產生了關鍵性的效果。

東晉習鑿齒(?—382)以蜀漢為正統，極力主張“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論”，所著《漢晉春秋》，以魏為篡逆。《三國志集解》引周濟《晉略》云：“自習氏創為紂魏紹漢之說，後世正統之論起焉。”^④

東晉偏安江左，與蜀之局處一隅形勢相類，蜀漢可為正統，東晉亦自然是正統。

唐皇甫湜(約777—約835)以魏繼漢，承認魏為正統，其論曰：

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實，終始可明，雖殊厥迹，皆得其正。以及魏取于漢，晉得于魏，史策



既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⑤

宋歐陽修（1007—1072）亦以魏爲正統，其《正統七論》之〈魏論〉曰：

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當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⑥

宋司馬光（1019—1086）撰《資治通鑒》，以魏之年號紀三國事，不承認蜀爲漢之遺統。其論曰：

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晉、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⑦

宋蘇軾（1037—1101）與歐陽修、司馬光乃同時代人，其《赤壁賦》如此描寫曹操：

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

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酾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⑧

一段文字，如長江之水，滔滔而下。“山川相繆，鬱乎蒼蒼”的遠景，“舳艫千里，旌旗蔽空”的中景，將“橫槊賦詩”的曹操形象烘托得分外高大醒目，真有氣吞萬里之勢。“一世之雄”的評價一字千鈞。蘇軾還指出了曹操個性的另一面，《魏武帝論》曰：“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⑨《諸葛亮論》又曰：“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⑩

南宋朱熹（1130—1200）以“蜀漢為正統之餘”，反對司馬光《資治通鑑》以曹魏年號紀事，曰：

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個書帝、書崩，而余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着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祇書甲子，而附注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方為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⑪

由於不承認曹操是正統，進而“因人廢言”，對他的文